

狮城脉搏 陈企业 沈财福

# 2015年大选后让一切回归常态？

随着大选热潮的降温和选后议论的渐趋平息，刚刚胜选的新加坡政府是否会让一切回归常态？在执政党获得选民强有力的支持下，我们是否应该期望，或者说新加坡能不能让一切回归常态？

大选之前，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之间已经就一些公共政策和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随着大选日子的日益靠近，各政党先后提呈竞选政纲后，朝野双方的激辩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大选期间，行动党和反对党共同关注，并且认为亟需解决的问题至少有四大方面，但是双方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却有着极大的分歧。

首先，行动党和反对党都认可新加坡必须减少对廉价却来源充足的蓝领客工的依赖，同时要确保本地工人能有可观的收入和加薪，以便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费开支。反对党主张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大量削减客工人数量，即便会造成经济增长放缓也在所不惜；行动党则认为，只有毅然通过提高生产力，实行渐进式薪金制，以及在外环境利好时逮住机遇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才是为本地工人争取可观的收入和加薪以应对生活费高涨的最佳方案。

其次，行动党和反对党都赞成，本地人在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PMETs）中的比例应该高一些，他们的薪酬也应该高一些。反对党的解决方法很直接，就是减少外籍PMET的数量，把更多职位保留给新加坡人。行动党则主张与“未来技能”计划（SkillsFuture）相辅相成的混合PMETs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公司或产业内部可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PMETs，但必须以新加坡人为核心。

第三，行动党和反对党都要确保新加坡人有能力在退休后安享晚年，尤其是低收入者。反对党主张保留原来的中央公积金政策，让会员能在55岁时领取所有存款，同时反对调整或提高原来的最低存款额。行动党则主张在55岁时提出部分存款，逐渐提高最低存款额，以确保公积金户头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老年保险。

第四，行动党和反对党一致希望看到，为大多数新加坡人而设的社会安全网能有显著的改善。反对党强烈主张建立西方模式的福利国家制度，除了补助失业者以外，也要在医疗保健、住房、教育和公共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给予大量津贴。行动党不赞成福利国家制

既然我们赋予了行动党政府另一个五年任期，就应该高瞻远瞩，尽量避免“向内看”，使新加坡继续成为一个耀眼的小红点。因此，我们必须一起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预作准备。

度，主张追踪基本公共服务的“负担指数”（affordability indices），反对补助失业者而选择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IS），因为只有继续工作才能减缓收入差距。

## 没有人会白白养活我们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大选中，将近七成选民应该是被行动党的竞选纲领所说服。更何况，至今为止，政府为因应上述四大方面的问题和困境而采取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既然选民已经给予行动党强有力的委托，授权李显龙总理组织新政府，我们是否应该对一切回归常态感到满意，期望行动党政府延续过去50年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让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逐渐成形和茁壮成长？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一再提醒我们，没有人会白白养活我们，而新加坡是否能够生存，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整体，不断自我更新，以确保新加坡能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同时得

领先竞争者至少三步。

在我们于2015年欢庆SG50之际，我认为下一任行动党政府应该着手规划长期生存之道，为新加坡在SG80及之后的美好未来做好准备。既然我们赋予了行动党政府另一个五年任期，就应该高瞻远瞩，尽量避免“向内看”，使新加坡继续成为一个耀眼的小红点。

因此，我们必须一起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预作准备。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全球语境下，对新加坡的公共政策进行以事实为依据的评估，谋划长期增长策略。我们可以通过构思有别于质化未来场景规划作业（qualitative futuristic scenario planning exercises）的三个量化研究群（quantitative research clusters），引导我们想方设法应对挑战：

一、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过去行之有效，现在仍然有效，今后可能也有效的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公共政策进行重新评估。由建国总理在1990年代初期首倡的“外翼政策”（External Wing Policy）是一

个好例子。这项政策促成了新加坡对外经济的扩张。这个全球驱动的新加坡经济增长是可以量化的。毫无疑问，它将继续作为推动新加坡未来增长的主要引擎。

二、对那些因为时移世易而须要微调的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公共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在我看来，就业入息补助计划就在其列。因为这样的政策一旦开始实施，要撤回在政治上是有难度的。因此，我们必须计算要花未来政府多少钱，我们是否可以设计一个让那些受益者退出的机制？

## 克拉运河问题的挑战

三、制定公共政策和未来新加坡增长的策略，使我们在后李光耀时代能与时俱进，推断新趋势的出现，从中把握机会，应对和掌握到所面对的挑战。在三个量化研究群中，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处理的是如何让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长期生存的问题。

一个好例子是流传了很久，却在2015年被重新提出来的克拉运河问题。现在的说法是，只要耗资280亿元就能在10年内开凿长达100公里的运河。假如这个仍在建议阶段的工程真的竣工，新加坡海港受到影响的上下限是什么？届时，樟

宜机场和预计在2025年建成的第五搭客大厦，在确保新加坡经济和世界各地保持连通的方面，是否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另一个好例子是辨识全球生产网络在亚洲内部的转移态势，抓住跨国公司所提供的机会。因为跨国公司必定会在制造业转移、评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怎样配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发展等方面有所动作。这样一来，新加坡就可以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企业方面，对追踪生产力，监视效率和改进生产力进行研究，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展开研究，尽快发现西方和亚洲的公司之间的潜在协同作用（potential synergies），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这将能够进一步加强新加坡作为区域总部枢纽的地位。

我认为，只要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是SG50或SG80，新加坡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陈企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及新加坡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主席。  
沈财福是傲胜（Osim）  
执行主席。张从兴译。